

许玄/著

绵长清溪水

许杰纪传

许杰



绵长清溪水

许玄 / 著

许杰纪传

许杰
家纪传
著
亲情回忆
书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亲情思忆·中国著名作家纪传丛书

主 编：徐迺翔 傅艾以

副主编：秋 之 卫建强

策划/总责编：姚 军

终 审：李仁发

复 审：姚 军

责任编辑：梁晋华

封扉设计：陈永平

责任印制：董建设 李 林

绵长清溪水

——许杰纪传

许玄 著

* * 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建设南路15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375 字数：242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册

ISBN 7-203-03928-5

G·1689 定价：17.00元



“小包袱”到上海
一年了(1946年)



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
时的父亲(1935年)



五十年代中期，最幸福
最快乐时期的父亲



暑假我从东北回家
看父亲(1960年)



父亲在北京拜访叶圣陶合影(1975年)



工作中的父亲(1984年)



在九十华诞暨从教七十周年祝寿会上(1989年)



父亲最后一张照片——与重外孙女在一起(1993年9月20日)

前 言

中国新文学运动发端于“五四”运动，是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产物。它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变革，前后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。对于中国人民来说，二十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、风起云涌的大变迁、大动荡的世纪。同样地，一百年来，中国新文学运动也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变迁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曾经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卓有成就的作家。他们直面人生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忠实而形象地反映出所处的那个时代、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图像。他们的作品，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，哺育他们健康地成长，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。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成果，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然而，作为二十世纪的作家们，无论是生活在建国前，还是生活在建国后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很不平坦的风雨人生。比如在这一辑中所辑入的十一位传主作家中，他们在

2015/10

建国前的黑暗统治时期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反动势力的迫害，而在建国后，他们的日子既有欢愉，更有曲折和苦难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，有的被打成“胡风分子”，有的被戴上“右派分子”帽子。在“十年浩劫”中，则无一例外都受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，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。因此，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道路通过纪传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，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是对文学史料的深入发掘和抢救。因为有些作家的子女也已经古稀之年了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，在得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姚军等同志的积极支持下，我们决定编辑这套《亲情思忆——中国著名作家纪传》丛书。

为了把这套丛书编得较有特色，我们不要求作者对传主作家的创作道路，作全面系统的回顾或评介，要求侧重在介绍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活背景，作家的日常家庭生活，包括与作家创作生活和创作风格有关的个人气质、社会交往、生平逸事等。期望多发掘和提供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事迹和史料，使每本纪传真正起到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历史作用。

同时，我们还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：要求撰写者必须是传主作家的亲属，或是配偶，或是直系、旁系亲属（包括女婿、儿媳等）。这样一来，当然会给组稿工作带来一定困难。因为在现当代作家中，尤其是那些著名作家中，不一定会有擅于写作的亲属。但现在实践证明，我们坚持这一条，虽然困难不少，但有不可替代的优势：史实真实可靠、情感真挚热烈。这是最大的好处。例如：《人在文坛》的作者路莘是耿庸的夫人，《镜湖水》的作者钱瓔和钱小惠是阿英（钱杏邨）的女儿和儿子，《自有岁寒心》的作者陈虹是陈白尘的女儿，

《霜叶红于二月花》的作者徐小玉是徐霞村的女儿，《瓣香心语》的作者王立诚是王统照的儿子，《魂梦潜山》的作者张正是张恨水的女儿，《从远天的冰雪中走来》的作者南南是靳以的女儿，《流云奔水话杨骚》的作者杨西北是杨骚的儿子，《绵长清溪水》的作者许玄是许杰的女儿，《耿介清正》的作者孙近仁，孙佳始是孙大雨的女婿和女儿，《乡土飘诗魂》的作者蹇人毅是蹇先艾的儿子。因此，我们相信，由传主作家的亲属亲自执笔撰写的纪传，肯定会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。

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因为要求作家亲属来撰写，就可以降低对写作质量的要求。有的书稿曾反复修改过三次以上。另外，在这一辑中之所以有许多知名作家未能入选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受到撰稿人选方面的制约。

这套丛书的撰写，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要尽可能做到内容真实生动、文字简洁活泼；既要提供有研究参考价值的材料，又要具有较强的可读性，文字要有文采。但在内容上不拘一格，形式上也不设框框。这样，不仅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愿望和兴趣，同时还为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教学工作者积累更多的史料，为推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进展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值此世纪之交的伟大时刻，能向广大读者奉献上《亲情思忆——中国著名作家纪传》丛书的第一辑，以迎接新世纪的到来，我们深感荣幸。二十世纪是值得大书特书的，二十世纪的作家同样值得大书特书。中国二十世纪的作家群星璀璨、光彩夺目，每一位作家都有辉煌的一生。相比之下，反映在这套丛书里的东西还太少太少。但愿广大读者能喜欢我们所做的这个尝试性工作，喜爱我们这套丛书，以坚定我们

的信心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继续一辑一辑地编辑出版下去，为我们祖国的文学事业迈向新世纪，略尽微薄之力，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徐迺翔

1999年8月 北京东郊

童心不泯（代序）

——怀念许杰先生

王西彦

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，是去年7月间许杰先生寄赠给我的一个条幅，上面是用一种颇为粗壮的笔锋所写的“仁者寿”三个大字，上款是“西彦我兄惠存”，下款是“天台许杰书，时年九十三岁”。在手头保存许杰先生的题字中，我特别珍惜这一幅，不仅由于它出自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的手笔，更因为我收到它不久，许杰先生就匆匆永离他素所眷恋的尘世。面对这幅可能是他绝笔的题赠，脑子里就涌现出一连串往事的记忆。

1936年10月深秋季节，我因奔父丧从北平回浙东老家，经过上海时，在一个朋友家里第一次见到许杰先生，他把自己的住址告诉我，邀我有空到他家做客。他当时是著名的作家和教授，我拜读过他的代表作品《惨雾》，他的邀请使人受宠若惊。尤其是他那一口浓重的浙东天台口音，再加上那一种平易近人的态度，给了我很大鼓舞。因此，等到办完父亲的丧事，从家乡回北平继续求学，又一次经过上海，就不揣冒昧果真登门拜访了他。当时，他住在小西门附近的马当路，门牌二十四号，是一幢普普通通的石

库门房子，而且是后楼。住在前楼的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复旦大学的教授。熟悉上海住房情形的人都知道，石库门房子的楼梯和灶间都在后楼，两家合用，住在后楼的人家显得颇为憋气。论身份，许杰先生在暨南大学任教，是作家兼教授，怎么甘愿住憋气的后楼呢？年轻气盛的我，很有些为他抱不平。不过看到他自己那安之若素的样子，也就不敢也不便有所表示。

回到北平以后，就和许杰先生建立起通信关系。刚好我根据一位失去东北家乡的关外青年朋友的遭遇，写了一篇题为《找寻道路的人》的短篇小说，发表在上海的文艺刊物上。当时我的写作题材正从农民生活转移到知识分子的遭遇，开始把自己的关心倾注到知识分子身上。《找寻道路的人》是第一篇，我认为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，是一个为自己找寻道路的问题。作为作品主人公的那位青年朋友，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流浪到北平，一直忍受谋生的煎熬，现在不得不重新出关回家乡去。等待他的命运会怎样呢？我写到和他握别时心酸落泪的情景。远在上海的许杰先生读了后，在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，说了些鼓励性的好话，只是在最后表示了一点小小的异议，认为作品的结尾难免给读者留下一种阴暗的情绪。我明明知道许杰先生的本意是为了提携我这个后进，却不能虚心接受他的评论中的那个意见，立刻写了一篇答复文章给自己作辩解，就发表在那个文艺刊物上。很快我就为此感到后悔，心想：“人家好心为你，可你用这种态度来回报他，以后还敢再关心你吗？”可是在抗战后期，从1942年到1945年间，许杰先生随暨南大学迁到闽西北的建阳县，担任教务长兼文学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的要职，虽然工作十分繁忙，却仍不忘记对我的关怀，给我出版于那个时期的长篇小说《村野的爱情》和中短篇小说集《海的呼啸》，都写了鼓励性的评论文章，后

来就收在他的《现代小说过眼录》里。这段时间，由于战乱中的生活不安宁，我东奔西走行止无定，和许杰先生的通讯联系已经中断，自然更谈不上见面相聚。可是我心里明白，他那双长者关怀后进的眼睛，始终在注视着我的踪迹。

我们彼此接触较多，是我于五十年代初定居上海以后，我原执教于杭州浙江大学，院系调整时被调来上海。当时，许杰先生任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。他得知我的工作将有调动的消息，就要我接受华东师大的聘请。可是，我的工作单位已经被安排在也是新成立的作家协会，我也觉得这样更适合自己的意愿。既然同在上海，而且身为老作家的许杰先生也经常参加作家协会的活动，大家自然不会缺少见面叙谈的机会。事实也正是这样。除了同时参加文学界的集会，平时不是我去学校宿舍看望他，就是他到我家里相聚。彼此的友情，很快就达到了心心相映、无话不谈的程度。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平易近人，而且童心不泯，一高兴起来就像是一个老小孩，彼此之间毫无年龄的隔阂。

在这里，我特别要提一提1957年那场“反右派斗争”和1966年以后的那场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。“反右派斗争”前夕，许杰先生原已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大学任教，为此他特地穿了一套新做的西服到我家里来“报喜”，高兴得像个小孩子，还把准备好的授课内容告诉给我听。随后他就兴冲冲地上北京去了，说是已经定好去莫斯科的飞机票。当我正为他的好机遇而高兴时，不料几天之后，他却神色懊丧地返回上海来了，说是由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发生突变，派他去莫斯科大学的打算被取消了。“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苦笑着说，“邦交出了问题，去不成莫斯科，连身上的西服也白做了！”“不要紧。”我安慰他道，“邦交变来变去，今年去不成，也许明年还可去，西装不会白做的。”就在那些日子里，知识界的气

氛颇不寻常，到处都在开“鸣放会”。过了一些日子，在一天夜晚，许杰先生来到我家里，从表情上使我感到他大概在“鸣放会”上闯了祸。果然，由于他那种小孩子似的坦诚态度，对学校的领导提了一些直率的意见，因而开始受到愈来愈尖锐的批判。“看起来，一顶右派帽子是逃不掉啦。”他脸色阴沉地说，“你说该怎么办呢？右派属于敌我矛盾，等于反革命！情节严重得很！”他还说这场灾祸似乎是命定的，在劫难逃，要不然，现在正在莫斯科大学的教室里高谈阔论，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参加什么“鸣放”。霎时间，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安慰他才好，只是劝告他好好检讨，求得从宽处理。不用说，戴上了“右派分子”的帽子，他的系主任职位被撤掉，不仅在学校里的地位一落千丈，在社会上也成为不可接触的人，别人都不敢和他打招呼。虽然有些会议还让他参加，也只是给他一个受教育的机会，坐在后面的位子上恭听大家的发言。即使当时我自己的处境也很困难，心情十分惶恐，侥幸没有戴右派帽子，也只不过是一名后来所说的“漏网右派”，身份低人一等；但我持有自己的看法，特别是对待许杰先生，总是尽可能地保持原来的态度。参加会议的时候，我照例和他坐在一起，互相问候交谈，甚至遭受会议主持人的干涉，也不愿意改变。我也仍然到学校里去看望他。这时他被赶出原来的宿舍，迁住到一间低矮而阴暗的小平房里，景象凄凉，令人酸鼻。我始终相信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无损于许杰先生的人格，不能影响我对我们之间的友情的珍惜。

在许杰先生遭受那场灾祸不满十年以后，我也遭受了别一场更为可怕的灾祸。在“十年浩劫”中，我被选择为上海文艺界第一个罪人，戴着一顶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”的大帽子，被专政了十年以上，从中年一下子推入老年的行列。挨批挨斗，下乡劳

改，名声狼藉，当然成为革命群众眼中的“不可接触的人”。这一次，已经戴过右派帽子的许杰先生被看做一只“死老虎”，遭受的苦难稍轻一些，行动比较自由，因此能有关心陷身水深火热之中的旧日友好的余暇。他曾经多次冒着别人惊讶的眼光和挨批受责的风浪，前来看望我这个罪人，还在我患病卧床的时候，送来使我能借以消磨时间的书籍。我觉得，当我们对坐面谈时，就像寻常时节一样自然，毫不隔阂和芥蒂。而每当二人握手道别时，我都感到眼潮鼻酸，咽喉梗塞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十分明白，正如他被戴上右派帽子时我深信他心地清白一样，现在我成为被专政的罪犯，他也深信我的心地清白。

因为彼此都从事写作，平时相聚谈话时，自然免不了经常要交换关于写作方面的意见。我们两人都出身浙东农村，都一面写作，一面又在高等学校任教，生活经历中有不少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。我们的初期作品，都采用家乡农村的题材。许杰先生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，中篇小说《惨雾》，描写发生在两个村庄之间的械斗，场面惨酷壮烈，人物性格鲜明，充分表现出被一种原始性的宗法意识所控制的农民们的愚昧状态。作品中着墨较多的人物香桂姊，她从新嫁的丈夫家所在的村庄回到自己娘家所在的村庄时，刚好目睹了这场可怕的械斗，尤其是自己的亲兄弟和丈夫同归于尽的情景。在我的童少年时期，也曾多次看到邻村因细小事故而引发的械斗，并且在自己的脑子里产生了“究竟为什么”的疑问。后来读到小说《惨雾》，这个疑问就变得更为强烈了。我觉得，在两个村庄的械斗中，最令人同情和悲伤的是香桂姊的悲剧。农村妇女在过去那个时代里的悲惨命运，正是我自己在开始学习写作时所最关注的，这也就是我特别看重《惨雾》的原因。我总觉得，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历史上，《惨雾》应该占有它特殊的

地位。许杰先生是早期重要文学团体“文学研究会”的成员，主张“为人生”的艺术，创作手法是现实主义的。他很重视作家在人品和文品二者之间的和谐统一。我记得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结束后不久，我们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议，住在招待所的同间房子里，晚上睡在两张并排的床上，趁机作纵情长谈，内容就是彼此漫长的写作生涯。首先谈到的是我们都从浙东偏僻的农村出发，好不容易长途跋涉才到达大城市并投身于写作事业，和那些原来就出身大城市并有机会享受现代文明的幸运儿相比，我们的劣势是很明显的；但就写作所采用的题材看，这种劣势同时也是优势，问题就在怎样利用它。接着就谈到彼此在这一点上的努力。他特别对我做了鼓励，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，希望就在我以后一代人身上。

这种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观念，在我们的交往中经常有所流露。有一次，他竟然说出“我觉得自己活着和死去没有两样”的话来。我懂得他的意思，是在哀叹自己在创作上已经不可能有新的成就，所以放弃了小说的创作，改写一些关于鲁迅的研究文章，并出版了专集，如《鲁迅小说讲话》和《〈野草〉诠释》。实际上，他很重视自己的生命，对现实世界有很深的眷恋。他在健康方面出现了小问题，例如心脏跳动较慢或是眼睛产生了重视现象，他都要跑到我家里来告诉我，商量怎样医治和怎样注意保健的方法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他八十五岁那一年，我祝贺他一定能够达到百岁高龄，成为人瑞。完全没有想到，他听了竟然满脸不高兴，道：“那么，照你看来，我不是只能再活十五年了吗？”我赶快改口说：“我的意思不是您只能再活十五年，而是先活到一百岁再说，以后的期限可以推到一百二十岁、一百五十岁！西方的科学研究，不是说人的正常年龄应该是一百五十或六十岁吗？”听我这样一说，